

一、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會前觀察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特約研究員郭瑞華主稿

- 研判「二十屆三中全會」或於今年 11 月或 12 月舉行；會議主題料將聚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及完善分配制度。
- 「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組建不到一年，已有多人涉及違紀遭調查，除凸顯習近平識人不明，也顯示「二十大」前中共的一連串推薦、考核、面談機制盡是表面功夫。此事雖損及習領導威信，但並不會撼動其領導地位。

(一)「二十屆三中全會」可能召開日期

依照往例，此時 10 月正是中共召開「三中全會」（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際或是進行會前準備中；但今次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否召開？何時召開？在本文截稿時，仍未明朗。從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開始，中全會逐漸制度化，每次黨大會後進行七次中全會，每次全會都有不同的任務。「一中」和「二中全會」與人事有關，前者選舉中央領導機構，後者討論國家機關和全國政協的人事安排；「三中全會」聚焦經濟與改革問題，「四中全會」則以黨建為主，「五中全會」則會審議下一個五年規劃（計劃），「六中全會」研究當時重要問題；「七中全會」則在下一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前夕召開，為黨大會進行準備。按照慣例，「三中」至「六中全會」係在每年秋天舉行，因此，中央政治局一般在同年 8 月召開的例會，預告中全會舉行的月份與議題，並在中全會舉行前夕的政治局會議宣布明確時程。但今年 8 月與 9 月舉行的政治局會議，均未公布「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時間與議題，以致引起各種揣測。

近年，中共在經濟方面，外部有與美國的貿易戰、高科技產業鏈脫鉤、地緣政治圍堵、俄烏戰爭及全球經濟衰退的持續影響。在內部歷經 3 年疫情封控，經濟下滑嚴重，疫後經濟復甦不如預期，房地產泡沫破滅、出口衰退和投資停滯、失業情況嚴峻、中央及地方財政收入回升乏力；同時面臨外企、外資外移嚴重，民營企業經營困難。在政治方面，官僚系統的怠政、懶政與貪腐不止，以及習近平親自拔擢

的官員紛傳出事，均降低民眾對黨國的信任度。

對外關係上，在多邊場合無亮眼成績，與美國關係改善曙光未現。在社會方面，過去3年嚴苛的動態清零防疫措施，導致社會不滿情緒升溫並蔓延，引發的民怨迄今未平。習近平掌權以來，今年可說遇上最多的挑戰，面對此一不利的內外情勢，其如何面對中全會，顯然一直費思量。中共「黨章」規定，中全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旨在聽取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討論並決定黨的重大問題等。因此，「三中全會」停開可能性低，今年11月或12月舉行均有可能。

(二) 會議主題或為「中國式現代化」或「共同富裕」

習近平上臺後兩次「三中全會」，「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十九屆三中全會」則提前在2018年2月底召開，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假如今次「三中全會」討論主題仍是改革，則可能聚焦如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習近平在2015年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及「中國式現代化」一詞，後在2021年建黨百年「七一講話」，及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又再提及；2022年10月，習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概括「中國式現代化」有五大特徵：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習近平同時表明「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今年2月習近平在中央黨校開班式上發表「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講話，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換言之，中共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旨在對世界上其他國家表明，世界上有一種非西方式現代化的可選擇性。

由於「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特徵之一，並在「二十大」將「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列入「黨章」，因此，中共亦有可能在本次「三中全會」，以推進「共同富裕」、完善分配制度為會議主題，深化經濟改革。為降低富豪疑慮，中共官員曾特別強調「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更不是劫富濟貧」，主要在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透過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調節方式，建立財富積累機制。然而，在陸經濟低迷之際，推動此一政策，勢必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三）結語：「三中」或進行人事調整

中共在選出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成員及中央領導幹部後，曾指出被推薦人選需具備「政治堅定、對黨忠誠，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強」，以及「帶頭嚴守黨的紀律和規矩，遵守中央八項規定和廉潔自律準則，道德修養好，清正廉潔，在黨內外有較高威信」等等條件，表明不進行「海推、海選」，而是經過推薦、考察、提名程序，把人選「察真識準」，並且是由習近平親自謀劃部署、親自指導把關。

然而，不到一年，卻已有數人已遭調查。首先，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於今年 6 月 25 日會見外賓之後，就未再公開現身。之後網路充斥秦剛消失原因，包括婚外情生子、涉及洩密案等。7 月 25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決定免去秦剛兼任的外交部部長職務，任命王毅為外交部部長。由於中共官方未公布拔掉秦剛外交部長、保留國務委員的原因，大眾只能繼續猜測。

其次是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自 8 月 29 日出席「中非和平安全論壇」後，未再公開露面；據信他係因在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長任內涉及貪腐，遭調查中。

三者，7 月 31 日，共軍中央軍委舉行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政治委員徐西盛晉升上將軍銜儀式，間接證實火箭軍前司令員李玉超、前政委徐忠波出事的訊息。目前共軍涉貪事件發展，指向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和火箭軍，以及軍工企業，其中被點名還包括「二十屆」候

補中央委員的火箭軍參謀長孫金明、航天科工集團董事長袁潔。此外，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巨乾生早前也傳出事，雖未獲證實，但確實久未在公開場合露面。

中共「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組建不到一年，已有多人涉及違紀遭調查，不僅凸顯習近平識人不明，也顯示有關「二十大」前中共的一連串推薦、考核、面談機制盡是表面功夫。尤其去年秦剛當選中央委員時，僅是副部級的駐美大使，同年 12 月底升任外交部長，今年 3 月又再晉升國務委員，成為副國級領導人。顯示其深獲習近平賞識，以致超越其他幾位外事領域部級領導，破格任用。如今，秦剛成為習近平用人難堪的一個典型。惟此事雖損及習的領導威信，但並不會撼動習的領導地位。

10 月 24 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免去李尚福的國務委員、國防部部長、國家中央軍委委員職務，同時免去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顯示中共中央將會在「二十屆三中全會」撤銷秦剛、李尚福的中央委員職銜，同時免去李尚福的中共中央軍委職務，補選新的中央軍委委員。

二、近期中國大陸內需消費觀察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所長吳佳勳主稿

- 疫情解封後中國大陸消費者信心仍未有效恢復，居民消費占 GDP 比重節節下滑。
- 陸疫後經濟復甦不如預期，有通縮憂慮，民眾對經濟前景悲觀，抑制消費慾望。
- 中國大陸多數民眾消費仍僅集中在飲食餐飲、醫療等「必要性消費」，疫情過後「恩格爾係數」大幅提高；但未能恢復至「發展性消費」如汽車、住房，故短期內難以達到經濟「內循環」訴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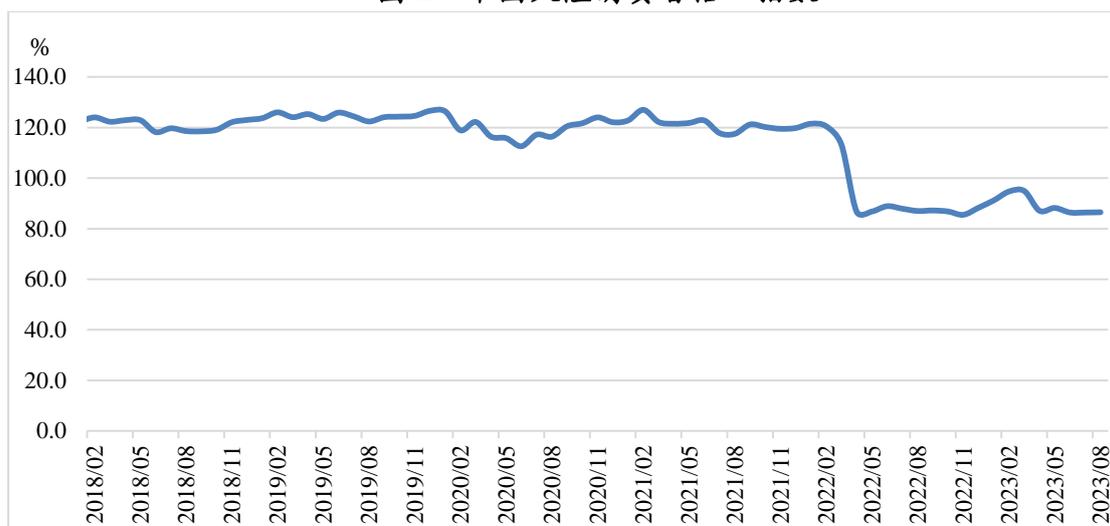
(一) 疫情解封後消費內需持續不振

中國大陸自 2022 年底結束疫情封控後，迄今已逾 10 個月，但整體經濟復甦力道不如預期，中央與地方政府均積極祭出各項「穩經濟」政策，各項經濟指標在下半年過後似有止跌回穩跡象。本文主要聚焦於中國大陸近期內需消費動能之變化，同時探討中國大陸推出多項促消費政策之成效。

首先就陸消費者信心指數來看（該指數主要用以反映消費者信心強弱變化的一種主觀感受，數值越高代表消費者信心越強）。圖 1 顯示，自 2018 年以來消費者信心指數多能維持在 120 上下，直至 2022 年 4 月過後，受上海疫情爆發並衍生後續多地長達 3 個多月的封控事件，消費者信心急轉直下，4 月降至 86.7 之後即一直維持低點，顯示即使 2023 年疫情解封，消費者信心仍未能有效恢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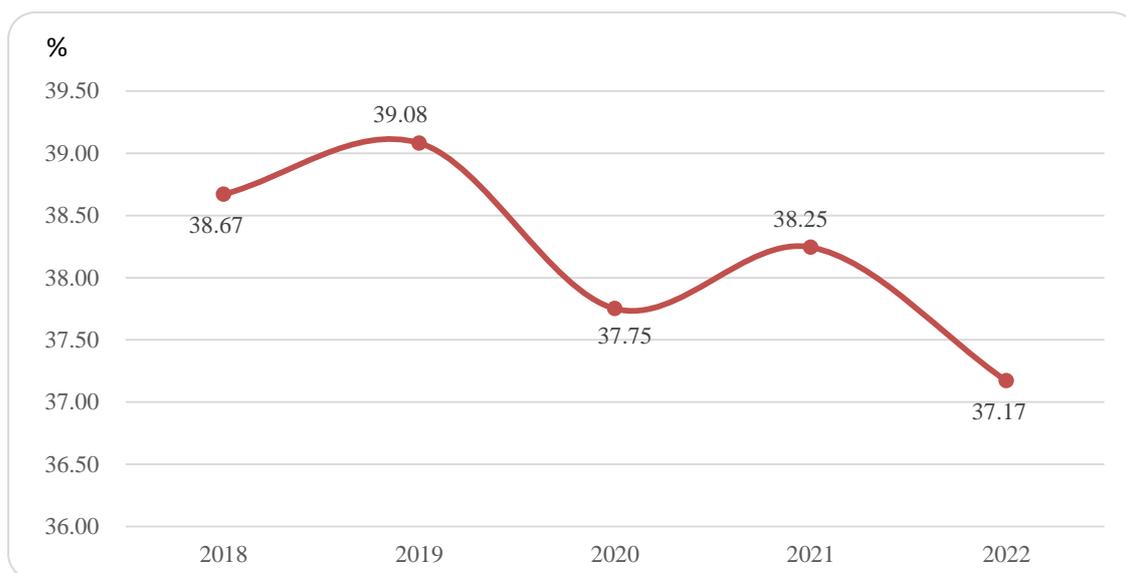
其次，再由家庭消費支出層面來看，陸結束疫情封控後並未出現「報復性消費」情事，尤其受到三年疫情影響，居民消費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節節下滑，至 2022 年降至 37.17%（參圖 2）。此比重遠低於其他先進國家（如美國該指標比重為 68.2%、日本為 53.9%、韓國為 48.4%，臺灣為 45.5%）。顯示居民的消費支出在疫情過後變得更加保守。

圖 1：中國大陸消費者信心指數



資料來源：CEIC

圖 2：中國大陸居民消費占 GDP 比重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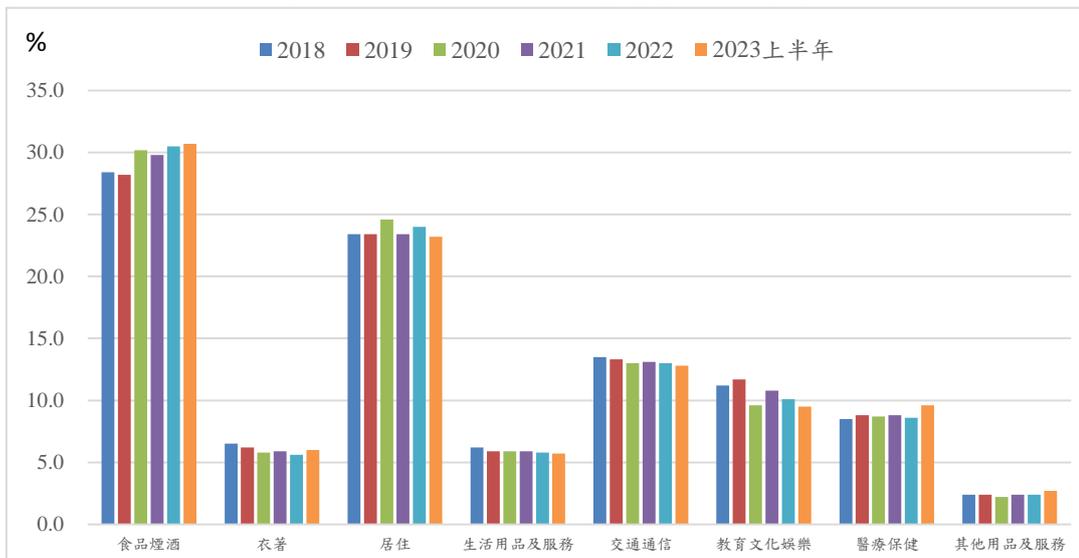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CEIC

尤其陸疫後經濟復甦情況不如預期，甚至存在通貨緊縮的疑慮，造成社會大眾對經濟前景的悲觀，民眾可能面臨失業或裁薪壓力，進而又抑制了消費的欲望，形成一種經濟上的惡性循環。

民眾疫情過後消費更加保守的原因，在於生活所面對的各種不確定性持續升高，包括醫療、居住、教育、養老等各方面的支出不斷增加，必須依賴更多的儲蓄以因應可能的需要。這種現象由近年來居民的消費支出結構也可看出端倪。

由圖 3 可知，除了居住成本占比持續居高外，自 2018 至 2023 上半年，陸居民消費用於食品煙酒、醫療保健的支出占比節節上升。其中食品煙酒的消費支出占比由 2018 年的 28.4%，上升到 2023 上半年的 30.7%；而醫療保健支出占比則由 2018 年的 8.5%，上升到 2023 上半年的 9.6%。這種現象可由經濟學的「恩格爾係數」(Engel Coefficient)來說明(該係數指家庭用於飲食消費支出所占的比重，可用以反映人們生活水準的指標)。依據德國經濟學家恩格爾的理論，當家庭所得愈高，其用於飲食費用的支出比率越小；反之，所得愈低，則用於飲食費用支出比率會越大。因此對比疫情前後，中國大陸的「恩格爾係數」大幅提高(由 28.4% 增至 30.7%)，顯示居民所得降低，致使無法節省支出的食品煙酒等消費支出占比提高，從而排擠掉衣著、居住、生活用品服務、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娛樂的支出占比。而醫療保健的消費支出增加，也反映出疫情過後人們對於醫療保健的需求增加，必須花更多的錢用於治療疾病，或有更多消費意願用以改善健康。

圖 3：中國大陸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構成



資料來源：中共國家統計局

(二) 中國大陸力推多項促消費政策

承上文說明，中國大陸在疫情解封後並未迎來消費復甦，不過就近期消費數據來看，隨著極端天氣導致的多場災害影響逐漸消退，疊加暑期出遊對消費的拉動，中國大陸居民消費意願在 8 月過後似有回暖跡象，8 月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年增 4.6%，上升 2.1 個百分點（高於

市場預期 3.45%)。其中在汽車類、石油製品等與出遊相關零售商品銷售表現較佳，餐飲、住宿、交通等服務消費也持續擴大。

在此之前，中國大陸為提振消費，於 2023 年 7 月底提出「關於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內容涵蓋 20 條促消費政策，包括穩定大宗消費、擴大服務消費、促進農村消費、拓展新型消費、完善消費設施、優化消費環境等措施，涉及汽車、住房、餐飲、旅遊、娛樂、數位消費等鼓勵機制。

其中在穩定大宗消費方面，主推新能源汽車消費和改善住房、居家電子產品消費，除了提供誘因鼓勵民眾購買外，還隱含多項軟硬體設施的公共投資，如電動車的充電設施等新基建投資在內。此一特點亦展現在完善消費設施政策上，包括改造城鎮商貿中心、推動冷鏈設施建設、改善倉儲保鮮物流設施等，顯示中共推動內需消費，仍大量依賴其政府資金的引導和公共建設投資來達成。

另在擴大服務消費方面，主推餐飲服務和運動休閒，比較有特色的是餐飲服務業部份，推動產業的垂直整合，由農場到餐桌，串連「種植養殖基地+中央廚房+冷鏈物流+餐飲門店」，宣導民眾健康飲食。而在藝文休閒方面，鼓勵企業提供帶薪休假制度，此政策推出約 1 個月時間，在 8 月底之時，已有超過 16 個省市（包括河北、江西、重慶、甘肅、青海、遼寧、安徽、陝西、福建、廣東、浙江、內蒙古、湖北、山西、河南、雲南）配合此政策對所屬地區企業做出要求。

除此之外，像是過去常被提出的鼓勵農村消費、新型態消費如數位、綠色、低碳消費、提供小額消費信貸、提升消費服務品質、消費品保障等措施，亦被列入 20 條政策規範之中。

(三) 結語

由於現已臨近年底節慶消費旺季，8 月份中國大陸各項經濟指標漸有改善，出口降幅也見縮減，整體經濟或將由谷底緩慢回升，但能否帶動消費內需上揚仍有待觀察。

以近日剛結束的「十一」長假來看，中共文化和旅遊部數據中心

預測（中共文旅部，2023.10.6），境內旅遊人潮將達 8.96 億人次，年增 86%，境內旅遊營收 7,825 億元人民幣，年增 1.38 倍，但仍未回到疫情前水準，或僅能彰顯境內休閒旅遊有緩慢回溫跡象。

因此總結當前陸內需消費情勢，顯示疫情對於居民生活衝擊仍大，所得差距不斷擴大（日本經濟新聞，2023.9.3），城市地區平均所得最富 20% 的家庭，已達最底層 20% 家庭的 6.3 倍，而此差距在 2015 年時僅 5.3 倍。主因疫情衝擊下許多中低階層家庭收入變得不穩定，民營企業或面臨倒閉或歇業情況，民眾被迫失業或減薪，經濟學人（EIU）即表示，疫情過後陸居民儲蓄率增加，顯示民眾對收入和就業不具信心，是消費市場失去活力的主要因素。

故現階段看來，多數民眾的消費大宗仍僅集中在「必要性消費」如飲食餐飲、醫療等，還未能恢復至「發展性消費」如汽車、住房等，要依靠內需消費來支撐產業發展，恐怕尚有一段長路要走，需有待解決貧富差距及改善居民收入後，要達到經濟「內循環」的訴求才有機會實現。

三、中國大陸青年就業觀察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員溫芳宜主稿

- 中國大陸今（2023）年 6 月的青年城鎮調查失業率達 21.30%，在此同時，中共官方宣布由於勞動力統計方法需要進一步改善，因此暫停發布青年城鎮調查失業率數據。
- 陸青年失業率逐漸攀升之原因，主要與高素質的青年勞動供應快速增加、受到疫情重創的經濟活動尚未完全復甦，以及目前的產業勞動需求與勞動供應特性不吻合所致。
- 北京近期的應對措施，聚焦於提供政策性崗位及針對企業提供聘用補助等方式，同時也為「困難畢業生」提供培訓與協助。

（一）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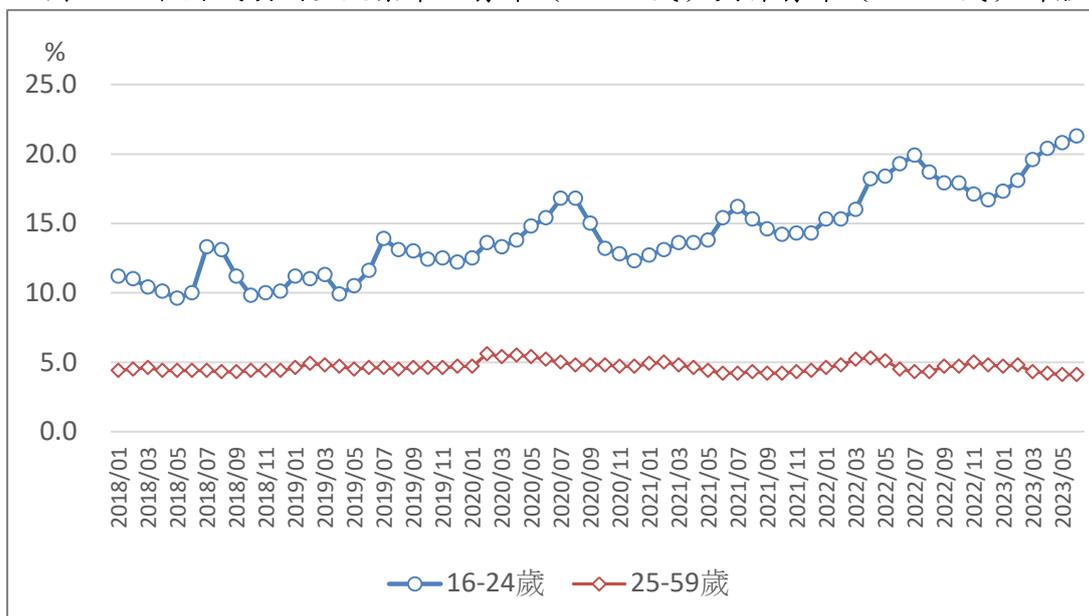
中國大陸統計局在今（2023）年 7 月的新聞發布會中指出，由於勞動力統計方法需要進一步檢討改善，以及關於青年的年齡界定與畢業前求職學生是否需要納入勞動力調查統計等議題仍須討論，因此自 8 月份開始，城鎮調查失業率當中 16-24 歲的青年數據將暫停發布。而在此之前，中國大陸青年城鎮調查失業率之數據已達 21.30%（今年 6 月份數據，於 7 月中公布），亦即每五位中國大陸青年當中，就有一位失業。有鑑於此，本文將針對中國大陸青年失業率之近年變化趨勢、失業率攀升之原因，及中共應對青年就業問題之近期策略，提出觀察說明。

（二）中國大陸青年失業率之近年變化趨勢

中國大陸自 2018 年開始，針對 16-24 歲青年的就業情況進行統計。由圖 1 可知，中國大陸青年失業率明顯高於非青年群體，除了每年 6-8 月的畢業求職季出現季節性的攀升之外，自 2019 年起，青年失業率也出現長期增加趨勢；每年 6 月的青年失業率數字，已經由 2021 年的 15.4% 增加至 2022 年的 19.3%，再增加至今年 6 月的 21.3%，創下歷史新高。至於非青年族群（25-59 歲）的失業率數值，

每年高峰大致出現在年底至隔年春節期間，基本上維持在 4.1-5.6% 之間，並無太大的波動。

圖 1：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青年（16-24 歲）與非青年（25-59 歲）群體



資料來源：CEIC 數據庫；作者整理

（三）青年失業原因討論

關於陸青年失業情況日趨嚴重的原因，首先，在勞動供給方面，勞動力的整體素質逐漸提升，每 10 萬人當中具有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之人數，由 2000 年的 3,611 人增加至 2020 年的 15,467 人。在此情況之下，每年普通本專科生及研究生畢業總人數不斷增加，由 2010 年的 613.8 萬人增加至 2022 年的 1,053.5 萬人，造成在勞動市場上，最沒有工作經驗的青年勞動力，反而是供應數量增加速度最快的群體。

其次，在勞動需求方面，過去幾年的新冠疫情對於陸經濟造成的衝擊仍然有待復甦。今年 10 月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今年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較去年同期增加 4.9%（前三季同比成長 5.2%），雖然被認為是高於預期，然而由於目前固定投資的成長主要由國營企業帶動、民間投資不振，且出口數據未見改善（前三季同比成長 0.6%），至於消費復甦目前主要聚焦在餐飲、服飾紡織品等消費品，因此，推測

陸產業發展動能目前尚未恢復，無法有效帶動青年就業。

除此之外，產業發展尚未趕上勞動素質提升，也可能是青年失業問題逐漸加劇的原因之一。由於青年勞動力代表的是高教育程度、高素質的勞動供應，然而中國大陸最初的經濟發展是由勞力密集型製造業帶動，近年來雖然服務業發展領先工業，但具有大量勞力需求、能夠吸納大量就業人口的服務業，仍屬於批發零售或住宿餐飲等行業。在此情況之下，近年來大量增加的青年勞動力，對於需要大量勞動投入的產業而言，可能反而有資歷過高、大材小用（overqualified）的問題，這也是陸目前雖在餐飲或服裝紡織等行業的消費復甦較快，但卻無法對青年高階勞動力之就業提供有效助益的原因。

（四）陸應對青年就業問題之近期策略

關於近期的青年就業問題，中共國統局在 7 月的新聞發布會上，提出幾項應對策略：

一是提供政策性崗位的招募工作，包括「大學生鄉村醫生」、「特崗計畫」、「西部計畫」、「三支一扶（支教、支農、支醫、扶貧）」等，藉此提供具備相關資格之畢業生進入鄉村、農村或西部地區，為當地醫療、教育、三農、基層社會管理等提供服務。

二是為企業吸納勞動力提供誘因，包括提供社會保險補貼、吸納就業補貼、一次性擴崗補助等，以提升企業招聘青年畢業生之動力。以一次性擴崗補助為例，是限制於企業聘用當屆畢業或是離校兩年內仍未就業的普通高校畢業生、登記失業的 16-24 歲青年，才能領取之補助措施，希望為失業青年就業提供機會。

三是針對「困難畢業生」提供協助，為脫貧家庭、低保家庭、零就業家庭以及殘疾畢業生等提供培訓項目，以提升前述畢業生之就業能力。

事實上，為了解決青年就業問題，中共早於 2022 年啟動「百萬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畫」，並且於今年 5 月及 6 月分別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實施百萬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劃的通知」以及「關於延續實

施一次性擴崗補助政策有關工作的通知」，惟成效如何尚待觀察。

（五）結語

近期引起關注的中國大陸青年失業問題，短期而言固然可說是疫情造成經濟衰退的後遺症，然而長期而言，產業升級與勞動力素質提升速度未能配合，可能才是青年失業問題的根源。在此情況之下，美國對於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圍堵，是否將不利於陸產業升級的長期發展，進而加劇其青年就業問題，值得關注。目前官方對於青年失業問題，主要以政策性崗位的提供及企業聘用補助等方式進行應對，然而後續如何在產業發展及勞動就業之間取得平衡，才是值得深思的議題。另一項值得關注的現象，則是中央為因應老齡化趨勢而可能推出的「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政策」，此一政策是否將對年輕族群的就業機會造成不利影響，也值得進一步觀察。

四、美、中高層軍事對話的困境

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丁樹範主稿

- 習近平不同意恢復與美進行高層軍事會談，一是嚇不下美國制裁中國這口氣，二是想將高層軍事會談籌碼化，三是擔憂美國尋釁製造危機佔便宜，再以高層軍事對話確立製造危機後的優勢。
- 惟中共充分了解與美保持溝通必要性，既基於美強中弱的現實需要，也是為緩和相關國家和國際對美、中兩國潛在軍事衝突的顧慮。
- 美國在反中氣氛下難以終止制裁，更不可能在美、中競爭下對敏感議題做出讓步，美、中恢復最高層軍事會談難度極大。

(一) 前言

第 20 屆「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 於本 (2023) 年 6 月 2 日在新加坡舉行時，人們期待的眾多議題之一是美、中國防部長能否正式會晤晤談。結果是使許多人失望：中國拒絕其中央軍事委員會 (中央軍委) 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Lloyd James Austin III) 正式會晤。這使很多人擔心美、中間的高層軍事對話中斷不利區域穩定。

中國拒絕的理由是李尚福被美國政府制裁，美國要先取消對李的制裁，才能展現出會談的誠意。該制裁是發生在 2018 年美國前總統川普任內；美國國務院是在 2018 年 9 月 20 日宣布，時任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長的李尚福因涉及與俄羅斯軍火商的重大交易，包括中國在 2017 年購買 10 架蘇 35 戰鬥機、2018 年採購 S-400 地對空飛彈系統，美國依「以制裁反制美國敵人法案」，將李列為制裁對象。

問題是，如果美國真的取消對李尚福的制裁，中國會同意和美國進行國防部長層級的高層政策對話嗎？反過來說，如果習近平真的整肅李尚福而任命新部長，美、中國防部長級對話的障礙就會消失嗎？答案是否定的。

要強調的是，否定的答案不代表中國不願意就軍事議題和美國接觸。只是，要在中國的條件下進行高層軍事議題對話。某種程度而言，

這符合中國一向強調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而中國作為大國是有本錢採取這種策略的，這也是國際談判常見的策略運用。

（二）持續會談

一個多月後的 7 月 12 日，中國駐美大使謝鋒應邀到美國國防部和印太事務助理部長瑞特納（Ely Ratner）進行罕見的會晤。他們談了 90 分鐘，涵蓋國防關係、國際和區域議題。瑞特納強調美國國防部維持美、中兩國軍事溝通管道的承諾。謝鋒則強調鼓勵美國妥協，使兩國和兩軍關係逐漸恢復到正軌。

一個月後的 8 月 2 日，中國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長楊濤也和瑞特納進行會晤，雙方討論了「美中防衛關係」，及區域安全議題。瑞特納在對話中強調，美方將繼續致力維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交流管道的暢通；楊濤則闡述了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嚴正立場，這是中國外交官第二次正式到美國國防部和相關官員就軍事議題進行對話。

謝鋒和楊濤拜訪美國國防部之所以值得特別注意，因為在中國政治體系裡，軍隊體系獨立於國務院體系之外，不受國務院節制和指揮。因此，雖然是貴為中國駐美大使，是中國駐美最高階官員，在官僚體系是副部長級，但是，大使通常不碰觸軍事議題，也不拜會美國國防部高階官員。楊濤的級別更低，只是司長級，更不會處理軍事相關議題。因此，謝鋒和楊濤能到美國國防部正式拜訪，必然獲得習近平的授權，傳達中國軍方的意見。

基於幾個原因，習近平不想和美國進行高層軍事會談。首先，他應該是嚙不下制裁這口氣，要求美國必須先取消制裁，才能有高層軍事會談。其次，習近平覺得美國急迫想和李尚福或其他官員會談，表示美國在軍事方面有求於中國，因而軍事交流是中國的籌碼。因此，中國可能期待美國在軍事議題上做出讓步後，才同意舉行高層軍事會談。再者，習近平也擔心，美國製造中國不想見到的危機佔了中國便宜，然後透過高層軍事對話確立製造危機後的優勢。故而習近平不同意恢復最高層級國防會談。

然而，習近平授權其外交官到美國國防部正式會談，也表現兩個

特徵。第一，他應該是了解，作為大國的美國在軍事議題上讓步不容易。第二，習知道保持雙方軍事交流的重要性，使溝通管道能維持住。因此，他對美國的要求做出相當的回應，授權外交官談軍事議題。

如何看待美國的處理方式？這其實反映美國了解中國要面子的文化，主動製造見面的機會，透過彈性處理維持主動性，並知道如何避開中國的敏感點，透過邀請謝鋒和楊濤到國防部會談以維持相當程度的軍事交流。另一方面開啟包括外交、財政、氣候、及商務領域的高層會談。

8月中旬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諾（John C. Aquilino）上將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徐起零上將在斐濟（Fiji）會談。他們兩人是在8月14到16日由美國和斐濟聯合舉行的第25屆印太國防軍司令會議（Indo-Pacific Chiefs of Defense conference）碰面。27個國家派出代表出席該會議。

其後，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大校在8月31日的記者會上說，「中美兩軍交往並非處於中斷狀態，雙方通過軍事外交管道保持著坦誠有效的溝通」。但是，吳謙也指責美國，「……當前兩軍關係確實存在著不少困難和障礙，這種局面完全是由美方造成的」。吳謙指出美方應切實拿出誠意並採取具體行動，為兩軍關係重返正軌創造條件。不過，吳謙並未透露徐起零與阿基里諾上將溝通的內容。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萊德（Patrick Ryder）准將則稱，美國的溝通管道隨時開放，特別是當兩國軍隊在相同地區運作時更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吳謙明確地說「中美兩軍交往並非處於中斷狀態，雙方通過軍事外交管道保持著坦誠有效的溝通」。同時，吳謙沒有透露斐濟會談的內容。這都表示，中國充分了解保持溝通的必要性，以緩和相關國家和國際對美、中潛在軍事衝突的顧慮。

（三）結語

我們如何看待中國的兩面作為：一方面中斷最高層軍事會談，但仍願和美國維持相當程度對話？主要原因是美國仍然是中國唯一的對手國。且經過過去三年和拜登團隊交手，中國知道美國的實力，不

論在外交、軍事、和科技，絕不是國內和全球某些人主張的「東升西降」。因此，中國即使百般不願也仍需和美國維持適度的軍事溝通，但同時中斷最高層軍事會談。這表示美、中要恢復中斷的最高層軍事會談難度很高，因為美國在反中氣氛下難終止制裁，更不可能在美、中競爭下對敏感議題做出讓步。

五、中共突破美國科技封鎖相關作為觀察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劉孟俊主稿

- 中共以民企納入新型舉國體制、擴大國際合作、運用稀土等原材料作為武器，及擴大運用國家安全相關法規等方式，反制西方技術封鎖，雖可向特定國家施壓，但也損害中國運營環境的優越與安全形象。
- 隨美中科技戰的爆發，全球經濟整合不再做為普世價值。此種分裂涉及經濟、技術、資訊、供應鏈等多層面，將使全球逐步邁向新冷戰。

（一）前言：美國的制裁與科技管制

近幾年，美中兩大強國之間，科技領域上的緊張關係持續升高。隨著科技在全球經濟、軍事同政治策略上的重要性越來越高，這兩個國家採取的行動，其影響已經遠遠超出國界。對中國科技崛起的憂慮，促使美國採取一系列策略行動，目的在遏止中國獲取關鍵科技，特別是在半導體領域，反映美國維護科技領導地位及應對認知中的國安威脅的更廣泛策略。

其中，半導體被視為現代科技的支柱，已成為爭議的焦點。尤其半導體晶片是各種智慧型手機及高科技軍事裝備的核心，其產銷已涉及國家安全和經濟主導權。半導體晶片為各種設備核心零部件，亦為現代科技實力的象徵，擔當從醫療到國防等各種領域創新的核心。因此，在半導體生產和設計的主導地位，代表重大的經濟和戰略優勢。美國為維護其科技優勢並回應可能的威脅，尤其限制與中國科技交流，特別是半導體產業領域並實施一系列限制。

對美國來說，維持這個領域的領導地位是優先事項，考量到其對國安和經濟競爭力的影響。為遏止中國在半導體領域的進步，美國實施一系列制裁措施。這些制裁主要針對先進電腦晶片出口到中國，意圖防止它們應用於像是高等運算或軍事用途的領域。美國已逐步限制中國企業取得生產先進晶片所需的關鍵技術。包括禁止像 NVIDIA 和

AMD 等大公司，將其最創新產品出口到中國。由於快速數據傳輸對現代 AI 應用的重要性，美國對晶片間傳輸速度設限，這直接影響依賴跨多晶片的龐大模型的相關技術。

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Department of Commerce's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於 2022 年 10 月 7 日發布一系列規則，旨在更新先進計算半導體和半導體製造設備以及支援超級計算應用和最終用途的物品的出口管制，對中國等在內的武器禁運國家實施出口管制。BIS 更新後的規則將提高控制的有效性，並進一步切斷中方規避限制的途徑，同時試圖解決中國軍事現代化對美國帶來的國家安全問題。

由於半導體供應鏈的全球性，即使是針對性制裁也可能對國際企業造成廣泛影響。國際企業的調適策略是開發客製化的晶片，符合禁令並迎合中國市場所需。像英偉達這樣的公司設法製造自訂晶片，迴避限制同時仍可服務中國消費者和產業。儘管面臨美國的嚴格制裁，英偉達仍設法為中國市場生產專用晶片，因應這挑戰環境。雖然這些晶片的效能可能不如美國同行，但對中國公司來說仍具優勢。像騰訊、阿里巴巴和百度等中國科技巨頭，都在營運中採用英偉達的 H800 晶片，突顯美中科技公司持續合作的局面。

中國早意識半導體產業於國家戰略的重要性，除已大量投資提升其國內產能，取代對海外晶片的依賴，也同時透過各種途徑反制美國的科技封鎖。本研究分別就中國推動新型舉國體制發展自主科技，擴大國際科技合作藉以突破封鎖。同時運用稀土等關鍵材料的出口禁運，並且運用其國家安全等相關法規作為威脅在陸外資企業，成為反制海外科技封鎖的利器。最後，於本報告的結語一節評估中國反制措施的全球影響，包括展望未來美中科技格局，對全球供應鏈影響，尤其以半導體成熟製程為例，以及觀察「一個世界，兩個系統」的形成。

（二）中國的反制措施

美中之間的科技角力，不僅是雙邊衝突，還引發全球科技版圖的漣漪效應。隨著美國收緊技術管制，中國採取一系列公開和非公開的

反制措施，以保護其利益並在全球科技領域占據位置。本節深入分析中國的戰略回應，以及對全球科技產業、國際關係和經濟動態等方面的更廣泛影響。

1. 中國推動「新型舉國體制」

中國成為全球科技超級大國的野心，深植於其發展國內創新和減少對外國科技依賴的承諾。從半導體製造到人工智慧，各個領域都可看出這股推動力。2022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通過「關於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的意見」，強調要透過「新型舉國體制」攻克關鍵核心技術。而所謂「新型舉國體制」，主要是「攻克關鍵核心技術」，主要包括科技領域「卡脖子」、基礎科學研究的弱點依然突出、內需潛力難以有效轉化為關鍵核心技術研發的動力，以及是科技創新的組織方式面臨新的要求。希望透過「新型舉國體制」加快驅動科技，先在 2020 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到 2030 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最後，在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

要達到「新型舉國體制」，除市場引導力量外，政府的介入是不可或缺的。過去中國大陸在推動產業發展時，會優先考量國內的國有企業，在政策引導產業發展時由國企領軍，企圖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個別優勢，形成科技創新共享平臺，進而提高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然而此舉未必有利民營經濟的發展。

觀察中國政府安排新一批民企高階管理人員參加 2023 年「兩會」的名單（表 1），多為代表國家新興戰略產業的電動車、半導體、AI、雲端運算和其他硬體戰略領域的企業家與研究人員，取代過去知名的中國大陸互聯網、房地產龍頭企業代表。或說明這些新興產業領域將成為中國未來科技發展的重心，這種變動也凸顯中國政策重點正在轉向提升其本土科技和產業供應鏈的自主程度，藉以回應美國與日俱增的封鎖與脫鉤的挑戰。

此策略的目的在於政府鼓勵國有企業發揮戰略支撐的作用，專注於國家安全、重點產業和前瞻性新興產業的科技自主創新，同時

支持民營企業參與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和重大科技項目，創建有利於科技創新的營商環境。中共雖不可能縮減民企的生存空間，但可能將進一步掌握民企並納入「新型舉國體制」的一環。顯示美中科技戰長期化，更加堅定科技自主，另立科技產業生態系的決心。亦突出美中科技產業脫鉤的態勢，不分國有與民企。無疑，民企為獲取科研補貼而僅能接受被納入「新型舉國體制」的一環。

表 1：中國大陸全國「兩會」科技產業界代表名單

領域	外媒關注的企業名單
AI	AI 巨頭「商湯科技」董事長湯曉鷗、「華虹半導體」董事長張素新、AI 晶片製造商「寒武紀」執行長陳天石
半導體	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校長，晶片專家李樹深、中國最大的代工晶片製造商中芯國際的工程師郭會琴
電動車	小鵬汽車何小鵬、寧德時代曾毓群、吉利控股李書福
網通	智慧手機製造商小米首席執行官雷軍、網路安全公司奇虎 360 首席執行官周鴻禕、阿里巴巴的技術指導委員會主席兼雲端計算事業部創辦人王健、電商平臺京東技術委員會主席兼雲端部門負責人曹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國重視科技自主有其戰略考量動機，尤其培育本土科技生態體系旨在全球科技版圖中描繪自主發展的途徑。為此，中國教育機構注重 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學科。清華和北大等中國一流大學已在全球工程科技領域上頂尖排名，並持續產出優異科技人才。中國也同時提供優厚薪資、研究補助金和頂尖設施的計畫吸引全球科技專家赴中。旨在運用全球頂尖人才提升中國的科技實力。

2. 擴大國際合作突破科技封鎖

中國塑造集體立場，旨在組建聯合陣線，抵制所感知的科技帝國主義。中國面對制裁所帶來的挑戰，尋求更緊密的國際科技合作。透過整合資源與專業科技，意圖加速科技進步降低對先進國家科技的依賴。中國積極尋求與其相似同樣也受美國及其盟友科技限制的國家，形成合作聯盟關係共同因應此一挑戰。首先，中國運用金砖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和「上海合作組織」等平臺或多邊論壇模式，共同表達其對單方面科技限制的擔憂。

中國亦同時透過雙邊科技合作模式，聯合研究計劃和投資協議等管道。此舉可加強中國的科技實力，打造緊密網絡關係，以平衡美國影響，確保中國在不斷演變的國際科技格局中保持關鍵地位。近年來，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積極推動與各國的戰略夥伴關係，並將其提升至更高層次。這些夥伴關係不僅涵蓋傳統的政治和經濟領域，更涉及國際科技合作層面。

表 2：中國近年發展對外夥伴關係-科技合作

國家	關係名稱	簽署時間	科技合作內容
阿根廷	深化戰略夥伴關係	2022 年 2 月	深化科技創新領域互利合作、行業人才交流、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科技成果產業化
白俄羅斯	升級全天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22 年 9 月	加強科技合作、創立聯合科研中心、實驗室、人工智能、5G 等新技術研發
坦尚尼亞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22 年 11 月	礦產資源、基礎設施建設、農業合作
蒙古	新時代推進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22 年 11 月	經貿、投資、基礎設施、農牧業、文化、教育、科技合作
俄羅斯	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2023 年 3 月	1. 深化科技創新領域互利合作 2. 行業人才交流 3. 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科技成果產業化 4. 應對氣候變化問題
巴西	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23 年 4 月	1. 航空公司合作 2. 通信領域和電子產品的技術研發
新加坡	建立全方位高品質的前瞻性夥伴關係	2023 年 4 月	貿易和投資、綠色和數字經濟、糧食安全、金融、航空及人文交流，特別是數位轉型合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運用稀土等關鍵材料為武器

此外，中國考慮限制西方獲取汽車業所需的關鍵材料和技術，是一個戰略舉措。透過對電動汽車必需原材料實施出口管制，中國可對美、歐、日韓等國的全球主要汽車企業施加巨大壓力。這些潛在限制也可以作為談判籌碼，讓西方國家在其他領域放鬆對中管制，如半導體領域。此舉凸顯中國利用一個領域的實力來為另一領域爭取優勢的能力。

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中國對部分關鍵供應鏈如稀土的輸出控制，提供獨特的外交工具。藉由實施關鍵原材料出口限制，中國可

施壓部分國家使其在地緣政治和科技目標上與中國立場一致。由於中國在全球稀土供應鏈上具主導地位，在稀土的儲量、礦產量、冶煉和磁材供應方面分別占全球的 37%、60%、94%和 93%，顯示其龐大的關鍵原材料供應鏈上具有絕對的控制力（聯合報，2023.2.2）。

過去以來，中國曾運用稀土供應鏈上的控制力成為外交施壓手段，2010 年中日釣魚臺主權爭議。當時，北京暫停對日本的稀土出口，對日高科技產業形成巨大壓力（關鍵評論，2019.8.7）。當中國暗示或實際實施稀土出口限制時，這不僅是對該國家的經濟打擊，更是一種地緣政治上的策略施壓。中國新規將限制 17 種稀土的輸出（信傳媒，2021.2.18），無疑為對特定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在某些關鍵議題上屈服。

4. 擴大運用國家安全相關法規與作為

美國制裁宣布後，主要中國科技公司立即面臨不確定性，從供應鏈中斷到研發可能遭遇瓶頸。除生產外，中國還積極尋求控制更多科技供應鏈。透過投資海外科技公司、收購科技資產和培育國內科技巨頭，中國旨在減少對西方科技的依賴，同時使自己成為全球科技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參與者。

中國選擇採取精準打擊策略，針對特定西方公司和部門遭北京制裁，例如，對洛克希德馬丁和雷神因參與對臺軍售而受到制裁。美光因北京以國家安全為由展開調查而受到關注，不僅是對美國限制的回應，中國也意在向半導體產業的關鍵廠商施壓。

當前中國應對與美科技衝突的方法，超越貿易和經濟領域。結合國家安全相關法規與作為已成為中國「工具箱」的成分。中國擴大運用「網路安全法」（2017 年實施）、「數據安全法」（2021 年實施）與「反間諜法」（2023 年修訂），加強網路安全管理，明確以數據安全為名規範數據處理活動的義務邊界與維護個人利益，更以反間諜上升國家安全層次。

透過以模糊或不明確的指控拘留個人，傳達任何反對中國利益可能產生的潛在後果。2023 年 3 月份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¹

¹ Mintz Group 是一家國際知名的調查服務公司（due diligence company）。其團隊遍布全

的北京辦公室與 4 月份美國管理顧問公司貝恩 (Bain & Company) 上海辦事處分別遭到搜查。4 月底，日本製藥公司安斯泰來製藥 (Astellas Pharma) 員工以違反「反間諜法」遭逮捕；5 月國際顧問公司凱盛融英 (Capvision Partners) 被調查。這類行動不僅損害外交關係，也為外資企業和在陸外籍人士營造不確定環境，凸顯外資企業在中面臨的風險升高，外國實體無法倖免於廣泛地緣政治緊張的影響。同時促使許多公司重新評估在中業務和員工安全方案評估，甚至暫停中國商旅計劃。中國這種做法雖可向特定國家施壓，但也損害中國運營環境的優越與安全形象。

(三) 結語：中國反制措施的全球影響

美中之間持續的科技角力，不僅是雙邊議題，其漣漪效應泛及全球。兩大超級大國的戰略舉措，尤其是中國的反制措施，影響深遠，遠超科技領域。科技戰已初步顯示會擾亂錯綜複雜的全球供應鏈。

1. 未來美中科技格局展望

未來中國反制措施的全球影響仍不確定，但幾個情境可能發生。一種可能是科技世界分裂，形成明顯的美國和中國主導科技生態系。或者，全球外交努力可能緩和對立，為協作科技進步鋪路。國際組織和條約在調解和設定全球科技標準上的角色，也將對未來科技格局形成至關重要。

科技衝突可能導致全球科技領導地位重新分配。美國傳統上被視為科技領導者，但中國快速進步與研發投資可能挑戰現狀。其他國家也可能抓緊機會，定位為中立的科技樞紐，在衝突科技巨頭之間提供中間立場。隨著中國加速科技自主，美國持續限制措施，全球科技生態系分裂成東西兩大陣營的可能性日增。這意味著東西方

球，擁有超過 400 名員工，分布在 9 個時區的 14 個辦公室。該公司提供多種服務，包括交易前的盡職調查、與第三方合作前的盡職調查、公司內部的盡職調查、反貪腐調查、證據蒐集以及詐騙調查等。近期，Mintz Group 在北京分公司被中國政府罰款約 150 萬美元，並拘留 5 名當地員工，原因是涉嫌進行未經批准的統計工作。

將主導不同標準、平臺和技術，增加互通性挑戰和全球科技合作障礙。創新動態：中國大力投入研發，美國致力保持科技領導地位，我們可能見證創新激增。然而，這些創新可能局限於各自地區生態系需求和標準。

科技戰可能擾亂全球供應鏈，尤其各國若被迫只能與美或中一方合作。從電子產品到汽車，許多產業可能面臨零組件採購挑戰，導致生產延遲和成本上升。中國是主要科技零組件生產國與出口國，美國是科技創新樞紐，任何中斷都可能對全球產業造成連鎖影響。作為全球最大半導體市場，中國佔近三分之一的全球銷量。其主導地位不僅侷限於消費，在供應鏈上中國也扮演關鍵角色，參與晶片生產和分銷的各個階段。

多年來，中國已認知半導體產業的戰略重要性，並採取重大步驟以增強國內產能。儘管中國在各科技領域有顯著進步，但其半導體實力與臺灣、荷蘭或美國等全球領導者比較，仍在發展中。在這領域追求自主的動力受到經濟和戰略考量的共同驅使。以半導體為重點，儘管中國半導體產業歷史上落後於美國和臺灣等全球領導者，近年來致力彌補差距。儘管面對技術和供應鏈挑戰，中芯國際等公司還是取得顯著進展，如開發 7 奈米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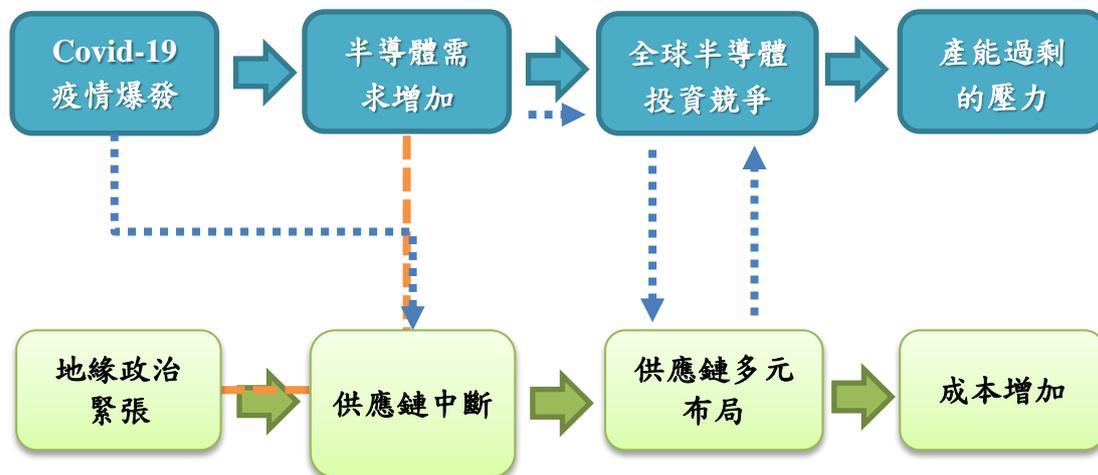
2. 全球供應鏈影響：成熟製程產能過剩疑慮

預期全球半導體，尤其成熟製程產品市場可能因投資擴張競爭，形成產能過剩壓力而削價競爭，唯恐進而再繼美日半導體事件後，再浮現成熟製程產品反傾銷與反補貼議題（見圖 1）。外資投資報告指出晶圓代工成熟製程從 2023 年起可能面臨供應過剩的情況。這是因為半導體廠擴產，預計到 2023 年市場需求可能會減緩（財經新報，2022.1.6）。

中國在半導體產業的投資持續增加，特別是在成熟製程方面。預估到 2027 年，中國的成熟製程產能比重將增加至 33%，臺灣成熟製程產能比重則恐自 49% 降至 42%（中廣新聞網，2023.10.18）。這一策略背後有多重原因和考量，一是成熟製程的技術門檻相對較低，對於中國這樣的新興半導體大國來說，從成熟製程開始投資和

建設，能夠較快地看到投資回報，並逐步累積技術和經驗。其次，雖然成熟製程技術未必先進，但在許多應用中，如物聯網、車用電子和消費性電子產品等，仍有大量的需求。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製造中心，對這些成熟製程的晶片有著巨大的內需。另中國政府長期支持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提供大量的資金和政策優惠，以促進國內半導體產業的成長。關鍵是，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中國希望能夠達成更大的自給自足，減少對外部供應的依賴。透過增加成熟製程的產能，中國可以更好地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並逐步減少對外部供應的依賴。

圖 1：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發展風險



資料來源：DBS Bank 研究報告

3. 「一個世界，兩個系統」的形成

在美中科技戰的背景下，中國採取多面手段作為回應，結合應對措施與長期戰略，以增強國內科技實力。中國大陸強烈反批美國價值不等同國際價值，美式民主也不等於普世民主。近年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固然表示其現代化要「走自己的路」，不隨美歐起舞，也意味有其特定的挑戰。美中科技戰的全球影響深遠，影響科技創新、國際關係和經濟動態。科技衝突可能重塑全球聯盟格局。國家可能基於經濟、科技和戰略利益被迫選邊站隊，導致新科技聯盟或集團形成。

美中關係的急速惡化不僅是雙方的問題，更是當前全球最核心的問題。科技戰不只是關於技術的競爭，還涉及到國家安全、經濟

利益、政治影響力等多個層面。美中科技戰的爆發，對這兩大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如 5G、AI 和半導體，兩國的競爭加劇導致全球供應鏈重新組態，並迫使許多國家選邊站（國際銀行家，2023.9.13）。

由於中國經濟快速崛起，使其在國際舞臺上具有獨特地位，對貿易和經濟動態具有重大影響力。尤其，中國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中發揮關鍵作用，由稀土出口管制，到智慧型手機和電腦的組裝，其參與深度與影響廣泛。為中國在與美科技對抗中提供槓桿，進而與美方分庭抗禮。中國已是許多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廣泛的貿易網絡意味著其重大影響力。透過「一帶一路」倡議等，中國大力投資全球基礎設施和發展項目，通常附帶經濟條件，讓中國滲透地主國政策決策中，尤其是與科技和貿易相關的。

總之，自冷戰結束後，全球一直在追求更緊密的經濟整合和合作。但隨著美中科技戰的爆發，此趨勢受到嚴重的挑戰。這種分裂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涉及到技術、資訊、供應鏈等多個層面，使得全球逐步邁向新的冷戰（大西洋理事會報告，2020.9.8）。

六、近期中歐互動及未來發展觀察

臺灣大學國發所教授暨歐盟莫內講座葉國俊主稿

- 中共是歐盟對俄羅斯能源制裁下最大獲利國；且隨戰爭長期化，及來自中、美兩國的產業競爭壓力，已對歐盟自身政經整合造成破壞。
- 北京採「各個擊破」方式，挑撥歐盟與各國關係，加之歐方對中國大陸經貿依賴甚深，致使各成員國及其政要態度游移不定。
- 歐盟石化等耗能產業出走，各國面臨「去工業化」就業壓力，中方對歐影響與壓力依然存在，「去風險但不脫鉤」成主要戰略。

(一) 前言

近期中國大陸與歐盟互動，有老問題與新議題，老問題是仍在凍結中的「歐中投資協議」，各成員國對此態度分歧，這又連帶影響到我國期待與歐盟締結的雙邊投資協議。新議題則如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von der Leyen）在盟情咨文中，強調不會坐視中國大陸對於純電動汽車出口補貼，之後即宣布正式展開反補貼調查，以決定是否開徵反傾銷關稅。

然而歐盟自己沒有補貼嗎？無論如何俄烏戰爭都改變其能源成本與運用的格局，包括歐盟主要國家的 G7 對俄羅斯進行石油出口價格上限，但最大獲益者卻是中國大陸與印度，因為價格上限使中方對俄更有討價還價空間，遑論過去歐洲最依賴的俄國天然氣，中方更能以更低代價獲取。能源成本優勢，將使歐盟石化鋼鐵等耗能產業進一步出走，去工業化所導致的就業壓力更大。無怪乎今（2023）年比利時與西班牙成為全球僅次於中方的俄羅斯液化天然氣進口國時，輿論才警覺俄烏戰爭後的「脫鉤」之說仍遠未實現，且隨著戰爭長期化與中方態度仍偏向俄方，極可能對於歐盟自身的政經整合產生負面影響。

(二) 歐盟各國步調不一滋生外界疑慮

不管形勢如何推移，歐盟之於中方，一直扮演分散對美國經濟依

賴的角色，歐盟亦較美國提供更多投資與技術移轉。當經濟、外交、人權等爭議逐次搬上檯面，中方改變對於布魯塞爾互動戰略，將重點放在對各成員國雙邊關係的經營，運用個別國家差異，推進北京的議程與利益，甚至挑撥歐盟與各國間關係（Divide and rule）。希臘曾因參與「帶路倡議」，抵制並令歐盟無法發布對中方人權狀況聲明，為歐盟的團結敲響一記警鐘。原先的 17+1 因多國退出而受挫，但匈牙利與歐盟候選成員國塞爾維亞的總統，仍趕赴北京的「帶路」十週年峰會。

然而整體來說，歐盟各成員國在分歧中仍有所進展：2017 年盟情咨文所倡議，主要針對中方資金的外資審核機制在三年內完成立法並開始執行。之後各國逐次建立各自的審核架構，並將外資投資案件向歐盟報備。雖不若美國 CFIUS 般嚴密，但對於防止惡意併購與技術外流仍起了很大的作用。

只是各方意見步調不一，仍不免令各方對歐盟政策的堅定性產生疑慮。例如今年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專員波瑞爾（Josep Borrell）稱，臺灣在經濟、商業以及科技上都與我們有關，因此呼籲歐洲海軍巡邏臺海，展現歐洲在此一絕對重要區域上自由航行的承諾。這番話卻立即遭到自己人，歐盟駐中大使度堯誨（Jorge Toledo Albinana）反駁為被嚴重誇大。而他與部份人士極力想促成「歐中投資協議」破冰，並曾在就任前稱歐盟支持兩岸和平統一，且中國只有一個，也同樣牴觸歐盟的「一中政策」。

（三）結語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與歐盟之間的雙邊投資並不平衡，後者是我國最大外人直接投資來源，而我國過去對歐投資占比極低。在地緣政治、分散風險以及歐盟晶片法案補助下，台積電的德國薩克森投資案可望成真，牽引眾多半導體上中下游的人員資金流入歐洲，並帶動周邊地區與成員國的投資發展與人員訓練。

但在前述歐盟各國及其政要態度游移不定，且「去風險但不脫鉤」語意與政策方向仍不明確下，中方對歐影響與壓力依然存在。正是因

為對中方貿易逆差已高達四千億歐元，且這種趨勢一旦形成，便極難逆轉，未來包括汽車與綠能都將是爭議焦點，偏偏在俄烏戰爭能源轉型需要且自身產能不足下，勢必依賴大量中方製造產品，這都使歐盟未必願在各項衝突中另添煩惱。事實上歐盟官方似已將臺歐 BIA 定位為政治而非經濟議題，在雙方經貿往來尚稱順暢下，具實質效果而非象徵性的作為，仍是歐盟強化與我國關係時較為偏好的做法。

歐盟另一個需要擔憂的議題，就是經濟復甦受限於戰爭、供應鏈分散與能源轉型而放緩。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無一不受影響，但歐洲接近戰場、各國意見導致政策形成緩慢、且對於俄羅斯能源依賴太深，所受負面衝擊因而較大。例如俄烏戰爭爆發後，德國能源價格升幅占消費者物價膨脹比重近半，相對其他各國是較高的。該國率先對家戶進行能源補貼，這種財力也未必是所有歐盟成員國都有的。然而對於工業能源的補貼，目前的聯合政府遲遲未能定案。由於歐盟受到美國廉價能源與降低通膨法提供補助，以及前述中國大陸來自俄方能源與廣大市場的雙重夾擊，其製造業提升至占 GDP20%的目標極可能成為泡影，而其中對於製造業最為關切的成員國德國，包括巴斯夫在內知名企業已聲稱絕對要向外出走，去工業化趨勢恐也將與原先「德國製造 2030」規劃背道而馳。

尤有甚者，來自中方與美國的產業競爭壓力，極可能對於歐盟本身的經濟整合造成破壞。由於各國經濟實力並不一致，並非每個國家都有能力如德、法等國般進行單邊能源與產業補貼，儘管這樣的作為基本上需要歐盟認可。但若實力財源較強國家擅自進行單邊補貼，或將引發金融市場動盪：例如投資人很可能在觀察到這種情況後，認知部份成員國財政與經濟狀況不佳，便自公債市場賣出該國債券導致其價格下跌且殖利率上升，兼以歐元區內國家並無資本有效管制，即會形成各國公債殖利率差距拉大這種近似歐債危機前夕的景象。與歐債危機與新冠疫情所不同者，當時各國多為經濟衰退，因此財政貨幣刺激政策有其功效；目前則是物價居高時期，過去的政策將會投鼠忌器，這反過來又將對於歐盟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形成考驗。

七、共軍近期臺海演訓及周邊軍事動態觀察

國防大學國際與國防事務學院戰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郝瑞麟主稿

- 解放軍近期在臺海的演訓活動，顯示其正設想透由灰色地帶方式逐步對臺施壓，且將「有限封鎖」視為作戰假定方案；並藉在臺海周邊執法強化管轄權，以維護其「一中」論述。
- 共軍跨越海峽中線，並由多個方位試圖侵入我周邊 24 浬限制水域（鄰接區）已成常態，造成嚴重飛航安全顧慮。
- 我方宜平衡現階段強化地面作戰與國家韌性的建軍思維，建構必要的海空軍載臺，以應對共軍「圍島鎖臺」與頻繁灰色襲擾。

（一）前言

共軍軍改後不斷強調實戰化訓練，在 2020 年頒布的開訓動員令中又新增了「實案化」訓練，即對假定的作戰方案進行驗證的戰訓活動。2021 年與 2022 年的訓令則加入了加強「戰訓耦合」的要求，要求作戰部隊的戰鬥與訓練要能相互銜接，強化部隊以演轉戰的能力。基此，筆者以共軍近年的開訓動員令重點，而非政治動機，去理解共軍近年在臺海周邊的演訓活動與軍事動態。本文認為共軍自去（2022）年 8 月至今年 9 月間的幾次針對性軍演，顯示中共目前所演練的假定對臺作戰方案即是搭配「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 /Area-Denial, A2AD）與「聯合封控」的「圍島鎖臺」作戰，而近期臺海周邊的軍事動態，也更加強硬的維護其所認定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一中」論述。

（二）共軍近期臺海演訓重點

共軍近期在臺海周邊的幾次大型演訓分別為：去（2022）年 8 月「圍臺軍演」、今（2023）年 4 月「聯合利劍」演習、8 月「海空聯合戰備警巡」、9 月創單日上百架次與 20 多艘軍艦的「海空聯合抗擊外軍」演訓，重點分述如後：

去年 8 月因應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來臺，共軍在臺灣周邊 6

處舉行實彈演習。當時的操演科目包括聯合封控、聯合制空、制海、聯合對陸地打擊、聯合保障行動等。中共不但公開宣稱否認海峽中線的存在，且將部分操演區跨進我國領海，嚴重影響我國主權。

今年4月針對蔡總統訪美，共軍舉行聯合戰備警巡與「聯合利劍」演習，模擬對臺灣周邊海空域實施聯合精準打擊、聯合封控與構建「圍島鎖臺」態勢，共軍航艦—山東艦亦配合進行相關演練。此外，本次演習也結合了中共海上執法單位，由其福建海事局平潭海事監管基地先啟動「臺灣海峽中北部聯合巡航巡查」專項行動，揚言其海事執法人員將對兩岸直航貨船、小三通客貨船實施檢查。

今年8月針對賴副總統過境美國，共軍在臺灣周邊組織海空聯合戰備警巡，舉行海空等兵力聯合演訓，重點演練艦機協同、奪取制權等科目，檢驗戰區部隊聯合作戰實戰能力。共軍東部戰區派遣驅逐艦、護衛艦、導彈快艇，空軍殲擊機、預警機、干擾機編隊，火箭軍常導火力單元等兵力，企圖塑造「全向圍島進逼」之勢。

今年9月共軍單日軍機創下上百架紀錄，同時有包括山東艦在內的20多艘軍艦於臺海周邊活動。中共國防部聲稱係為年度計畫內的正常安排，旨在檢驗部隊聯合訓練成果、提高多軍兵種聯合作戰能力；並聲稱解放軍將常態化組織此類演練，強化軍事鬥爭、一線練兵，堅決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依據該演訓活動的兵力與實施方式、地點研判，應為模擬抗擊外軍（反介入／區域拒止）的實案化演習。

綜上，共軍這4次的演習皆與其所宣稱的圍島鎖臺目的具有明顯相關性，可視為共軍利用灰色地帶進行軍事威懾行動，同時也進行有限封鎖，或稱為隔離（Quarantine）作戰的實戰化演練。共軍現已將此類操演定名為「聯合戰備警巡」，並視為常態化演練，未來可能配合海上執法單位於臺海周邊，隨著政治的需要以決定操演範圍與時間，甚至可能以演轉戰成為有限封鎖作戰，逐步施壓，迫我接受政治談判。

（三）共軍近期在臺周邊軍事動態

去年共軍公開否認海峽中線後，其兵力不斷的跨越海峽中線並於多個方位試圖侵入臺灣周邊24浬限制水域（鄰接區），成為一種「新

常態」。我方軍機（艦）為阻擋其進入，會嘗試以各種方式要求其轉向飛（駛）離我 24 浬海空域，故雙方軍機（艦）常會接近到具有飛（航）安顧慮的距離。

今年 6 月美軍飛彈驅逐艦「鍾雲號」與加拿大皇家海軍巡防艦「蒙特婁號」穿越臺灣海峽時，共軍飛彈驅逐艦「蘇州號」在距離 150 碼（約 137 公尺）處橫切美艦船頭，造成航安顧慮。

今年 10 月媒體報導共軍軍艦與日本軍艦於臺灣東北部海域對峙。美國國防部 10 月也公布一系列畫面，指控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機近年來在東海與南海上空的脅迫與危險行為急遽增加，過去 2 年共進行近 200 次攔截。危險行徑包括投放干擾絲、發射照明彈，或快速逼近美機，這類脅迫性行為恐導致擦槍走火，或引發不必要的飛航意外。

隨著中國大陸軍事科技進步，共軍機（艦）現代化已大幅提升，共軍為了維護其周邊海空域的安全，既使外國軍機（艦）未進入其領空、領海，共軍也會將此類抵近偵察活動視為對中國大陸的不友善行為，並藉著危險逼近的方式迫其遠離。這類活動目前有擴及到臺灣西南部與東北部區域的跡象，顯示中共欲藉此類活動強化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一中」論述，並讓外國軍機艦遠離中國大陸包括臺灣在內的海空域範圍。

（四）結語

政治或可決定演習的強度大小，但演習的科目與想定卻是早已計畫完成的軍事專業。共軍近期在臺海的演訓活動與諸多軍事動態，顯示中國大陸目前可能設想透過灰色地帶方式逐步對臺施壓，並將「有限封鎖」作戰視為對臺作戰的一項假定方案；另藉著在臺海周邊進行執法活動強化管轄權，以主張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一中」主張。

近期共軍在臺海周邊的危險行為激增，甚至有擴大到臺灣東北部與南部巴士海峽的跡象。共軍的相關行為易導致發生飛（航）安意外，我方除持續譴責此類行為外，亦須思考建立兩岸飛航危安防範與處理機制，避免意外肇生或擴大事端。

現階段我國軍建軍指導方針多朝向強化地面作戰與國家韌性的方向進行，但中共近期的軍演模式明顯走向「圍島鎖臺」與灰色地帶襲擾的模式；對此，我方宜平衡建軍思維，建構（更新）必要的海空軍載臺，或改變現有的對應方式，以因應共軍的威脅挑戰。